

· 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 ·

RAYMOND WILLIAMS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MARXISM AND LITERATURE

[英] 雷蒙德·威廉斯 / 著

王尔勃 周 莉 /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英]雷蒙德·威廉斯 著

王尔勃 周 莉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6—2008—4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英]雷蒙德·威廉斯著;王尔勃、周莉译.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9

(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

ISBN 978-7-81091-870-1

I. 马… II. ①威…②王…③周… III.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研究 IV. A811.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2052 号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First published 1977

First issued as 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perback 1977

Reprinted 1978, 1985(twice), 1988, 1989

书 名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著作责任者 [英]雷蒙德·威廉斯 著 王尔勃 周 莉 译

责任编辑 张 珊 王宝童

责任校对 程 庆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辉县市文教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36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威廉斯无疑是英国战后出现的最有影响的文化思想家和作家,他把文化概念放回到社会和政治的理论探讨的核心地位上,而且随着历史记载逐渐被人们重审,显然,威廉斯将被赋予英国 20 世纪独有的最重要、最具原创性的文化思想家的地位……威廉斯更应当被视为英国左派整体的权威代表——思想睿智,独立特行,研究题目带有其后的社会主义者们无法匹比的多面性。在理论成就上堪与之媲美的,稍远可以提及法国的萨特或德国的哈贝马斯,他们都在有生之年就超越了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最近在世的欧洲学者中唯有皮埃尔·布迪厄——后者也如同威廉斯那样,其著作表现出某些同样的种类各异的超前洞见,联结着同样的坚定的政治批评。

——[英]特里·伊格尔顿:《〈雷蒙德·威廉斯:写作、文化、政治〉前言》

威廉斯的思想地位在许多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他无疑是战后英国学识最渊博、最有成就、读者最广泛、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作家。……他终生致力于研究和从理论上概括文化客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他的著作不仅被当做目前的战略性介入,而且被视为与尚未具体化、尚未来到这个世界的未来听众的对话。

1977 年,威廉斯出版了他的学术成就最高的一本书《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该书在理论上有明显贡献。尽管该书作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压缩,显示了重新构想整个领域的雄心,但这本书依然是威廉斯对他当时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所作的最清楚的表述。

——[美]罗伯特·戈尔曼 编著:《“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

## 探询和研究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

——写在《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付梓之际

如果我们对 20 世纪西方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左翼理论做一个“盘点”，不难看出，其最有贡献的研究领域当属文化理论；同样，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为人类做出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也在文化理论。因此《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首先把目光投向 20 世纪西方重要的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理论成果，并以译介和研究上述理论为本丛书的首要目的，这是因为，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把目光投注到现实社会，试图用马克思的原理和当代伟大的思想成果，去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问题。在他们的理论结构中，既有马克思的原理部分，又有当代思想文化的最新成果，还有面向现实的维度。这种理论结构与我国新时期的理论走向非常一致。新时期文学批评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指导下，在对西方当代思想的合理吸收，中国传统文论精华的再度发掘等等综合因素的整合之中，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探索和解答。正是由于有上述相同或相似的境遇、动力因素和理论结构因素，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发展在热点问题的提出，争论的发生，某些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态等方面，都与西方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左翼的文化理论有似曾相识之处。

改革开放近 30 年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抱着完全否定的观念研究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少了，以前那种纯粹批判的态度，也转变成在了解、交流和撞击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

立,汹涌澎湃的商品大潮,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大众文化、商品文化的平庸性,精神价值的失落,引起了不少理论工作者的忧虑,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应运而生。有些人突然间发现,自己的处境与心态似乎和西方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模一样,在现代化的潮流中,他们放眼国内外,都感到一种“资本主义”式的压迫正在进逼。于是,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抗拒和批判的张力与武器。不过,此时理论界的动力与武库并非仅此一个,后现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某些原则和理论上根本差异,但这两种思潮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的交叠重合处也很多,在我国,理论界几乎是同时在使用着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武器,而并未感到有重大的区分和不便。在中国的知识界,对现代化导向最坚定和最彻底的批判者往往是这样的两位一体:他们心仪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拥抱后现代主义,这就是我国理论界的现状,这也就是探讨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理论界的影响的意义所在。

我们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工人革命运动低潮的产物,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和西方社会自觉的或被动的自我调适、自我变革,西方各国大体上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身处这种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和社会变革家,再去发展一种经济危机及其爆发的理论,再去制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策略,既无紧迫性,也无实际意义。但是,现代化社会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毫无问题,从马克思的原始出发点——即人的解放,消除异化,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看,现代发达社会中的人一方面得到了物质享受,另一方面却在人性上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从主观上想坚守初衷不变,还是客观上形势使然,走上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道路,并以他们的深刻和执着,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作为一种(在否定的辩证法这种意义上的)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病理诊断,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基本精神是相契合的。

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20世纪国外左翼学者所倡导的文化理论毕竟是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它本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建构。本丛书通过对国外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论辨析,对经典马克思

主义的若干原点问题展开富有新意的研究,这对我国学术界是具有启迪意义的。作为整套丛书,既有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有国内学者的研究心得;既有译著,也有专著;所涉猎的研究领域包括文化身份、社会心理、大众传媒、互联网、广告、青年与妇女问题等等热点问题,涉及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

我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但巨大的社会变革也引发了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乃至社会心理等各方面的巨大变化,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汹涌而来的商品潮,大大激发了中国知识界的批判意识。终于有人领悟到了,时代的前进使人面临着一种问题转换: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仅止于抨击守旧意识,为改革鼓与呼,而且要从价值层面对现代化的方向、后果或伴随现象加以监督,做社会公正的发言人、精神和文化的守护者。由此,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它的批判理论必然成为人们寻求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解放的思想武器,因此,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知识界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文化,乃至哲学、社会思潮的层面,而迈向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我们有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必要,这也是编辑本丛书的初衷。

愿这套丛书为国内学术界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 回望跨世纪的理论接驳者

——关于威廉斯和“文化唯物论”的断想(代译序)

一位身材顾长的学者行走在剑桥校园,却一身乡间平民装束。他面容和蔼,神情专注,瘦削的脸庞上刻满皱纹,嘴角紧抿,微微眯起的眼睛里闪现着明澈、犀利的目光。当我们今天回望这位已仙逝 20 年的老人时,眼前浮现的就是这样一幅图象。

### (1)

雷蒙德·威廉斯(1921—1988),著名英国文化学者、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新左派”的核心人物、“文化研究”的理论奠基人之一。他学识渊博,在文学、社会学、文化史、传播学及电视理论、女性主义等多门学科多种领域均有重要建树;著作宏富,发表过近 30 部论著——主要有《文化与社会:1780—1950》(1958 年)、《漫长的革命》(1961 年)、《现代悲剧》(1966 年)、《乡村与城市》(1973 年)、《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1974 年)、《关键词》(1976 年)、《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 年)、《政治与文学》(1979 年)、《唯物主义和文化中的问题》(1980 年)、《文化社会学》(1982 年)、《走向 2000 年》(1983 年)等——以及数百篇论文和多部小说、剧本,其分量与密度相当惊人。他生前长期置身于地域和思想的“边境”默默著述,所创建的“文化唯物论”甚至被人看做带有某种“保守、老派”的色彩。



然而身后盛誉却铺天盖地：“英国 20 世纪唯一的最重要、最富独创性的文化思想家”，“英国左派的权威代表——思想睿智，独立特行，研究题目带有其后的社会主义者无法匹比的多面性。”<sup>①</sup>他的“思想地位在许多方面都无与伦比，无疑是战后英国学识最渊博、最有成就、读者最广泛、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作家”。<sup>②</sup> 学者们认定威廉斯的理论成就堪与萨特、哈贝马斯、布迪厄相媲美。国际学界甚至有人赞叹“英语的威廉斯同德语的卢卡契、法语的萨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三位文论家”<sup>③</sup>。这种生前身后的反差值得玩味。

更值得玩味的是威廉斯思想上的“开先”与“启后”。曾经与他发生过论争的伊格尔顿赞赏道：当年巴赫金的见解在符号学家眼中还只是微弱闪光时，威廉斯就早已是一位‘巴赫金派’的社会语言学家了。威廉斯也先于哈贝马斯许多年，论述过交往活动理论的主要命题。虽然算不上专门的女性主义作家，可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撰写《漫长的革命》的时候（当时妇女运动尚未崛起），威廉斯就对“生育/抚养体系”作出了重要表述。“当人们费尽力气攀上某些理论的峰巅时，就会发现威廉斯已通过他个人冥思的途径悄然领先，早就抵达那里”。<sup>④</sup> 专事整理、研究威廉斯作品的学者艾伦·奥康纳说，威廉斯多重维度且不断演化的著作现已有三代读者，其中既有他的同代人，即 20 世纪 50 年代的“新左派”，也有比他年轻而偏好 60—70 年代的“语言论转向”和结构主义的那一代人；而 80—90 年代兴起的第三代则是他最好的读者，他们认识到，威廉斯的著述同福柯、赛义德、斯皮瓦克以及德·劳瑞蒂丝对于话

---

① 特里·伊格尔顿《前言》，选自艾伦·奥康纳《雷蒙德·威廉斯：写作、文化、政治》，伯索·布莱克沃尔出版公司，1989 年版，第 7 页。

② [美]罗伯特·戈尔曼编著《“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赵培杰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 年第一版，第 852 页。

③ 转引自《外国文学评论》，1989 年第 4 期，第 141 页。

④ 出自特里·伊格尔顿主编《雷蒙德·威廉斯：批判视野》（诺思伊斯顿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一书的《导言》，参见该书第 6 页。

语和政治的强调之间存在着一种亲缘关联。<sup>①</sup>

(2)

威廉斯理论上的这种敏锐、倔强、冷静和深邃源于他的生命体验和政治实践。许多学者注意到,威廉斯不仅是文化与政治、文学与戏剧、电视与传播诸多方面的重要作家和学者,更是一位社会主义作家和活动家。他出生于威尔士边境乡村的一个铁路工人家庭,靠自学奋斗考入剑桥三一学院。1941年应征入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1945年退役返回剑桥读书。毕业后在牛津从事工人教育长达15年,并埋头于理论研究和著述。曾与人合办过《政治与文学》杂志,并成为《新左派评论》的重要撰稿人。1961年接受剑桥大学教职,后被聘为耶稣学院研究员。1971年被选为院士,1974年荣任剑桥大学建校以来设立的第一位戏剧讲座教授的席位,此后一直在剑桥工作到去世。

受家庭的影响,威廉斯14岁时就投身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入大学后经常同剑桥这样的上层文化堡垒发生冲突。在大学中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于1939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45年返回剑桥后,他虽不再参加共产党的组织,却一直积极致力于社会主义运动。50年代他积极参与裁军反核运动和新左派运动,后又组织发表1967年和1968年社会主义者宣言,也曾声援1968年的学生工人运动。他一直大力支持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运动以及和平运动,80年代中后期又多次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圆桌会议”,对当代世界的许多重大问题投入巨大的关注,对社会主义的基础与前景作出积极的展望。奥康纳指出:“这些政治内涵都凸显在威廉斯的全部著作中,他始终特别关注那些因主流文化话语和政治话

---

<sup>①</sup> 艾伦·奥康纳《雷蒙德·威廉斯:写作、文化、政治》,伯索·布莱克沃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9—10页。

语的压制而缄默失语的人们和事物。”<sup>①</sup>

(3)

无论是把他一生著述分作三个时期还是四个时期,学者们都公认《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年)是威廉斯后期代表作。西方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称之为威廉斯“学术成就最高的一本书”,该书“以令人难以相信的凝缩,显示了重新构想整个领域的雄心”,从而对文化唯物论作出“最清楚的表述”。<sup>②</sup>可以说,他此前的著作都是在确立和建构这一理论,而此后的著作则是在发挥、发展这一理论。回望威廉斯,其实就是对文化唯物论的回望。而当人们把文化唯物论放在“文化研究”30多年的发展脉络中,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8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放在整个20世纪西方文学/文化理论的总体格局中加以审视时,必然出现一系列问题:威廉斯的文化唯物论为何具有某种“开先—启后”性?文化唯物论又显示出文化研究的何种内在必然性?在伯明翰学派高峰期已过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在更大的范围内理解和评价这种理论?

要回答上述问题,当然要细究文化唯物论本身的起点(对此,国内研究者大多针对威廉斯初期的左派利维斯主义立场,故而主要关注他与乃师利维斯的渊源/反拨关系),但我们觉得更应该通过梳理、把握这一理论的内在逻辑(下文将对此试作某种勾勒)来获解,而这首先要放眼整体的理论和历史背景,洞察促使这一逻辑产生、兴起的必然之“势”。古语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饶有意味的是,不论是从“文化研究”自身理论脉络切入,还是

<sup>①</sup> 艾伦·奥康纳《雷蒙德·威廉斯:写作、文化、政治》,伯索·布莱克沃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9页。

<sup>②</sup> [美]罗伯特·戈尔曼编著《“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赵培杰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第856页。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进程着眼，甚至进而从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的整体格局俯瞰，我们都会发现“势”呈现为“正一反一合”的辩证发展，而威廉斯的文化唯物论恰恰呈现在此三重理论关系之“合题”的位置上。

(4)

先看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的整体格局中的“正一反一合”。

艾布拉姆斯的文艺坐标表明，无论是再现论还是表现论、实用论，到19世纪末文学的“外部研究”已经达到鼎盛。所以，当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的青年学者们揭竿而起，对传统文艺理论展开冲击的时候，这一世纪上半叶文艺学、美学的“向内转”乃“势”之必然。这种“内转”有两个系列：一是由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直至结构主义文论依次展开的语言论美学系列，另一个则是发端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文论，进而由荣格（神话原型批评）、霍妮（女性主义精神分析）以及拉康（后现代精神分析）等拓展衍化的心理学美学系列。这些流派虽彼此相异相悖，又都相补相生。形式主义的“陌生化”必然引出“差异在于关系”的结构观念，“新批评”的“文本自足”和“细读”也必然要专注深层象征模式，从而指向结构主义文论。但结构主义要挣脱单一文本的束缚，探究诸多文本共同隐含的意义模式，就又必然要联系社会、文化、历史的研究。同理，精神分析专注无意识和生命本能，但“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冲突本身就隐含着解决社会矛盾的期盼。而弗洛伊德的高足对个体无意识来源的追索也必然导致集体无意识、文化无意识、政治无意识等范畴的出现。于是，语言论美学和心理学美学都抵达了再度“向外转”的临界点。

在现象学和存在哲学中的“阐释”观念的催化作用下，特别是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对话性”、“反本质主义”、“去中心”、“话语一权力”等观念的推动下，20世纪60—70年代之交第二次转

折——“向外转”(又称“文化论转折”)开始了。福柯、拉康、德里达、巴尔特、巴赫金、阿尔都塞等共同开启了后现代理论的大门。此后,与一直延续发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相呼应,一系列再度重视历史,面对现实的社会、政治、性别、种族问题的批评理论——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方兴未艾。而打破学科界限又融通上述理论方法的“文化研究”则后来居上,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与实践平台。威廉斯正是悄然登上这个平台的先行者。

如果把19世纪的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文艺学视为一种正题,那么,20世纪“向内转”以后的语言论/心理学文艺学美学就是一种反题。而70年代以后再度“向外转”以来的一系列后现代文论流派方法包括“文化研究”就是一种合题。

(5)

同样的“正一反一合”也出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系列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虽然流派众多,但进入兴盛期则基本按照两条理路先后演进:前一种是“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路(以法兰克福学派、萨特、列斐伏尔等为代表),后一种是“结构主义或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路(以阿尔都塞、戈德曼、马歇雷等为代表)。二者强调的侧面不同,但都认为在马克思原著中可以找到依据。前一种理路特别关注西方现代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条件下人的解放问题,因此尤为强调人的主体性,并以此作为理论基点,力主通过“审美乌托邦”、高扬“新感性”来抵抗工具理性和消费主义带来的现实异化。后一种理路则深入一步,强调人们所谓的“主体”、“自我”不过是一种被意识形态“召询”出来的虚构,占据它的位置的实际上只是一个拥有社会生产身份的社会存在,因此这一理路强调的是通过“症候阅读”,破解隐藏在日常生活、公共领域乃至人们无意识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上述两种理路的“合题”集中体现在由威廉斯的文化唯物论、

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杰姆逊的后现代辩证批评等理论所开辟的“文化社会学”或“文化马克思主义”维度上。这一维度现正由伯明翰学派、鲍德里亚、布迪厄、拉克劳、墨菲以及默多克等人的研究所扩展、深化，目前已形成一个鼎盛的研究领域。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萨特、列斐伏尔等强调的人本主义理路是“西马”的一种正题的话，那么，阿尔都塞及其后继者所强调的科学主义理路则可以看做是“西马”的一种反题。那么，以威廉斯、伊格尔顿、杰姆逊等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则体现为又一种合题。

## (6)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研究”内部也出现过由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范式引发的“正—反—合”问题。早期的文化研究呈现出一种批判庸俗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强调文化的解放力量和人的主体性的“文化主义”倾向。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内部又出现强调阿尔都塞的思想，把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来进行分析的结构主义倾向。前者看重人的经验和主观能动性，后者则强调“决定性的条件”，强调结构统一体中不可避免的复杂性，强调对经验也要做“解中心化”。应当说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确补充和纠正了早期的文化主义的缺陷，但它本身也暴露出某种偏颇和局限，如过分强调“结构整体”及其决定作用而牺牲了“过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针对这一缺陷，后期的文化研究中出现了“葛兰西转向”，依靠对“文化霸权”理论的重释、发展和运用，克服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对立。在这个过程中，威廉斯的角色较为复杂。人们通常把他和霍加特、汤普逊视为文化主义的代表。但事实上，威廉斯在同结构主义倾向争论时，也积极地吸取了阿尔都塞理论中的有益成分，又较早地采纳并发挥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在作为文化唯物论最终表述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清楚

地显示了这样的理论走向。

所以,如果说早期的人文主义范式是“文化研究”的正题,那么,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结构主义范式就是其反题,而“葛兰西转向”以后威廉斯的文化唯物论就是其合题。

### (7)

在三重合题的格局中,我们可以隐隐地发现,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独特术语、新奇逻辑的文化唯物论其实正以细密绵长的理论触角,顽强地勾连、贯通着20世纪文学文化各方思想码头;而威廉斯堪称一位默默无言、辛勤工作的理论“接驳”者,为沟通融合这些理论,他沉稳倔强地构筑出一块坚实的“文化社会学”的锚地。

《“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认定《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以令人难以相信的压缩,显示了重构整个领域的雄心”,此言不虚。威廉斯本人也表示,这本著作是他创作上的新起点,是在同其他理论和探讨模式的长期交互作用中产生的思想成果,是基于过去研究中所获得的一切而作出的“纯理论”推导(他甚至一一列举书中主要概念同自己此前的各部著作的对应关系)。《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正文仅210页左右,却在“导言”之后分别列出“基本概念”、“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三个内容宏富而阐述精练的专章。与《文化与社会》相似,威廉斯以四个关键词——文化、语言、文学和意识形态作为文化唯物论的“基本概念”,既展示四个概念所标示的领域的学术史演进,又揭示理论脉络背后汹涌的历史潮流。在其后的“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中,则又以一系列关键词为主干展开逻辑推演。威廉斯站在他所认定的马克思的思想立场上着力建构的文化唯物论,既是“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强调文化与文学的物质生产之特殊性的理论”<sup>①</sup>,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

<sup>①</sup> 见本书“导言”第6页,原著第5页。

“马克思主义传统”)在文化/文学理论中所起作用的系统反思。这种“调整自己对迄今所知的马克思主义本意的尊敬以及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距离”<sup>①</sup>的作法旨在摆脱僵化模式,把马克思主义看做积极地辩证发展的理论。尽管在某些地方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误解和偏颇,我们依然要对威廉斯的努力先作出肯定,再作出取舍和修正。

对于这部思想高度凝缩、内容跨度极大、以纯理论方式演绎的论著,译者在此尚不能做导读,下面且以阅读札记的方式试作勾勒和点评,是谓“断想”。

## (8)

文化是什么?威廉斯没有对上百个定义作辨析和分类,而是从文化不仅体现为成果而且也体现为发展矛盾这一点说起。在他看来,“社会”、“经济”、“文化”这些后来才出现的历史系统表述,不但“随着不断变化的历史经验发生着交互作用”,而且原本在形成过程中就孕育着许多尚未解决的疑难,后来的理论发展恰恰由此生发。

威廉斯认为,文化理论的总基点应当是由维柯最早提出而马克思主义重新加以强调的“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一命题。威廉斯曾用一种辩证的系统方式梳理出文化的三层定义:一、人类的一种完善过程;二、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三、整体的生活方式。前两层显然是指精神生活和艺术方面的业绩,后一层才是他最为看重的。不过,他也看到这种相互联系补充的定义引发了巨大的理论分歧。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也留下了新的难点。马克思主义通过对文明社会(市民社会)的批判,强调人们是通过生产自身的生活方式来创造人自身历

<sup>①</sup> 见本书“导言”第3页,原著第3页。



史的，从而克服了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发现了社会与经济之间的构成关系。物质的历史第一次被纳入整体历史之中。然而，留下的难点是将文化从社会物质生活中分离出去，文化被看做是由物质历史所决定的次生性的上层建筑。结果，文化作为构成性的人类过程这一意义则被某些人以唯心化的方式加以发展了。到了20世纪，他们甚至以此排斥和压抑马克思主义。威廉斯的反思和论述便由此起步。

## (9)

威廉斯超越了“对现实的反映”、“心灵的表现”、“抽象的客观的符号系统”等语言观念，紧紧抓住马克思、恩格斯的命题：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自身存在的现实意识。他强调指出，语言是活动，具有构成性的建构能力。他独具慧眼地大量引征选取了实际作者是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的内容，指出符号的二重性——形式因素和意义是由处在某种持续的社会关系中的现实个体彼此间进行的持续的言语活动所造就的。从而他提出一种“社会语言”观念：“由此可见，我们所发现的并不是各自存在的‘语言’和‘社会’，而是一种能动的社会语言。……语言作为实践意识，既被所有的社会活动（包括生产活动）所渗透，也渗透到所有的社会活动之中。……语言就是这种能动的、变化着的经验的接合表述[the articulation]，就是一种充满能动活力的、接合表述出来而显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社会在场[social presence]”。<sup>①</sup>威廉斯的这种语言（符号）观是其文化唯物论的核心和关键。他打破了传统理论（反映论或表现论）所惯用的语言“工具”观念，看到了语言和一切符号表意行为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是人类对世界的一种社会性建构。他像结构主义者一样，发现并肯定了语言

<sup>①</sup> 见本书第38—39页，原著第37—38页。